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历史的辉格解释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求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历史的辉格解释

〔英〕赫伯特·帕特菲尔德 著

张岳明 刘北成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辉格解释/(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岳明,刘北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7-100-13290-9

I. ①历… II. ①赫… ②张… ③刘… III. ①史学理论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28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历史的辉格解释

〔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
张岳明 刘北成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290-9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

定价:16.00元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本书根据 G. Belland and Sons, Ltd., London 1950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译者序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基督教思想家,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963—1968),20世纪“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菲尔德研究领域广泛,著作颇丰,涉及宗教与历史、历史编纂学、科学史、欧洲现代政治史与外交史、18世纪英国史以及国际政治理论等诸多领域。其最有名的四部史论著作《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31)、《现代科学的起源, 1300—1800》(*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 1949)、《基督教与历史》(*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1949)以及《人类谈论自己的过去:关于史学史的研究》(*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1955),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界思考及研究历史的方式。他的非国教徒身份、卫理公会的循道主义信仰、对辉格式历史编纂的反思,以及对“信仰与历史”两者之间关系的持续关注,成就了他在20世纪英国史学界的独特性;而他在欧洲现代外交史、历史编纂学、科学史、国际政治理论、现代学术与宗教思潮等领域的研究和思考,则奠定了他在20世纪西方知识界的重要地位。

鉴于国内对于巴特菲尔德的著作译介较少,研究不多,在这里



有必要介绍巴特菲尔德的生平、基本史学立场及其在西方当代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1900年,巴特菲尔德生于约克郡的奥克森和镇,并在当地的卫斯理循道会堂接受洗礼。巴特菲尔德早年就读于基斯利贸易文法学校,爱好文学和历史,虔信循道主义。他于1918年成为卫理公会的地方牧师,并于1919年被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录取,1922年获剑桥大学文科学士学位。1923年,他凭借征文《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获勒·巴斯(Le Bas)奖。硕士在读期间,师从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H.坦普利,1926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起担任彼得豪斯学院全职研究员和试用讲师,开始了他40余年的现代史教学生涯。同年,他的首部学术专著《拿破仑的和平策略,1806—1808》(*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出版。1931年,反思史学编纂的专著《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标志着巴特菲尔德史学思想中诸多核心问题的成型。1938年起担任《剑桥历史学杂志》(*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编辑(1938—1952)。

1944年至1963年,巴特菲尔德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这一时期是巴特菲尔德学术生涯的丰收期。1949年出版的《乔治三世、诺思勋爵和民众,1779—1780》(*George III, Lord North and the People, 1779—1780*)、《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以及《基督教与历史》这三部著作使他声名鹊起。自1950年起,诸多学术机构开始邀请巴特菲尔德进行公共讲座。同年,巴特菲尔德被聘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顾问。1955年,巴特菲尔德被选为剑桥大



学彼得豪斯学院院长。1959年至1961年任剑桥大学副校长。在这近20年里,巴特菲尔德在现当代国际政治、历史编纂以及“信仰与历史”等领域内都有诸多专著和文章问世。除上述著作外,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著作还包括《现代世界中的自由》(*Liberty in the Modern World*, 1952)、《基督教、外交与战争》(*Christianity, Diplomacy and War*, 1953)、根据贝尔法斯特系列讲座整理出版的《人类谈论自己的过去:关于史学史的研究》、《二十世纪的国际冲突》(*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0)以及《今日的大学与教育》(*The Universities and Education Today*, 1962)等。

1963年,巴特菲尔德始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963—1968)。1965年被选为英国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65年至1967年,巴特菲尔德受格拉斯哥大学吉弗德(Gifford)讲座邀请,进行了两场关于宗教与历史的讲座,讲座的题目分别为“历史著述与基督教信仰”(Historical Writings and Christian Belief)和“人类的信念与历史著述的发展”(Human Belief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Writings)。1967年,巴特菲尔德入选为爱尔兰皇家学院荣誉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68年被授予爵士封号,同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荣誉副会长。

1968年,巴特菲尔德正式退休,并搬入剑桥郡索思顿(Sawston)的一幢都铎式住房中。1974年巴特菲尔德被母校剑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79年于索思顿逝世。



一、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的两面性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曾评价巴特菲尔德是“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一位基督徒”。巴特菲尔德的研究者 C. T. 麦金泰尔(C. T. McIntire)则认为他是一位“基督徒历史学家”(Christian Historian)。无论如何,巴特菲尔德是一位高度关注历史学方法、理论、框架和视角的历史学家。他在关于诸如历史编纂、历史观念等问题的思考中,融合了他的信仰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思考,这往往会让人觉得他的史学立场存在内部矛盾,而这恰恰又成就了他史学思想的独特性。他曾坦率地承认,个人原罪、救赎和天意等基督教观念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他的循道主义信条及对辉格派自由主义传统的深切同情,使巴特菲尔德相信,历史上个体的性格要比宏大的政府或经济体系等外在条件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巴特菲尔德曾经把他自己的史学旨趣划归到诸如卡尔·贝克尔、皮特·戈耶尔和 G. P. 古奇等历史学家中,他认为他们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他的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继任者 O. 柴德维克也曾就此把他归为“剑桥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计量主义、马克思主义、行为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同,“剑桥历史学派”强调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强调历史学所展现的是人的各种愿望和目的。另一方面,他对于循道宗提倡谦逊的信奉以及对 J. B. 伯里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念的继承,也使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发生的转变,历史转变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们意愿的互动的结果,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包括道德判断,历史编纂的风格也不应该是目的论的,而我们所



有的判断都只能相对于时间和情境而存在。

二、《历史的辉格解释》与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的形成

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是巴特菲尔德史学立场两面性的集中体现,书中的内容也是贯穿巴特菲尔德史学生涯的核心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对《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成书背景和主旨做一解释,以便展示巴特菲尔德思想的复杂性。

早在巴特菲尔德的剑桥学生时代,剑桥大学就出现了两种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剑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 G. M. 屈威廉和他的前任 J. B. 伯里。屈威廉认为,历史学就是一种文学门类,是“学术中的艺术”。他主张历史学家应该运用同情的想象,进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在人格之中,强调历史写作中叙述、情节与风格的重要性。而 J. B. 伯里则认为就历史学的性质而言,最应该强调的是它的科学性。他非常熟悉兰克开创的史学传统,并且想要进一步地使历史学科学化。伯里认为,在历史学的诸种规律中,最重要的就是因果律。他认为如果把历史学研究所积累的材料按照因果链条来安排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就能达到更大的科学客观性。值得注意的是,伯里也对机缘巧合所导致的偶然性、历史趋势、历史境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面对这两派的争论,刚从研究生阶段迈入讲师阶段的巴特菲尔德有他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巴特菲尔德的文学修养让他与屈威廉趣味相投。他曾在一篇文章(《历史作为文学的分支》,1951)中,把自己部分地放到了屈威廉和卡莱尔的历史学传统之中。另一方面,他对伯里也心有戚戚。他对于规律、境遇和历史的偶然性



的反思,一部分则来源于伯里的启发。

在剑桥大学的学术氛围中,除了上述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对巴特菲尔德的思考产生影响之外,对现代史讲席教授阿克顿勋爵的推崇也是促成巴特菲尔德写作《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原因。阿克顿勋爵对于巴特菲尔德来说具有非凡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与巴特菲尔德一样,阿克顿也是基督徒,在他的历史写作中,基督教占有重要的位置。阿克顿具有天主教徒的虔诚,相信天意,更重要的是,他看重人类的自由,重视作为灵魂化身的个体的价值,这些品质都得到了巴特菲尔德的共鸣。但是,阿克顿勋爵也同时认为,历史学家具有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裁判的权力,不仅仅可以裁判他们的行为后果,也可以臧否他们的人格。这样的史学立场触怒了巴特菲尔德的宗教敏感,他的循道主义把谦逊和对待别人的善意作为最高的价值。由此,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谦逊而有局限性的,道德判断并不是历史学家的分内之事。对阿克顿史学立场的反思使他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解更加深刻。

当时,一战给欧洲投下的阴影仍未散去,英国知识界普遍对目的论式的进步史观有所批判和怀疑。1928年,牛津大学历史学家H. A. 费舍在拉赖(Raleigh)讲座上做了题为《辉格派历史学家:从麦金托什爵士到屈威廉爵士》的演讲,从而把作为政治党派的“辉格派”与特定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观念结合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巴特菲尔德发展出了他自己的关于历史编纂问题及历史观念问题的理解。他着手考察“辉格派”历史学家屈威廉的观点,并以屈威廉的作品《大改革法案中的格雷勋爵》(*Lord Grey of the Reformed Bill*)为靶心批判目的论式的历史编纂。进而,基于他



对自己史学实践的反思,他注意到了许多历史学家写历史作品,都把自己最喜欢的当代事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顶峰,认为那是从过去的某一时刻直线进步达到今天的结果。在考察诸多英国历史作品的过程中,他尤其注意到了一种史学倾向,那就是太过于强调过去几个世纪的新教辉格派是当代英国政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始祖。巴特菲尔德注意到,阿克顿勋爵所坚持的,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道德裁判的史学立场,只会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历史学家借此可以在道德上指斥那些被认为是妨碍自由发展的敌人。

1920年代,巴特菲尔德反复在脑海中思考这些史学编纂和历史观念问题,并且依照他多年的习惯,把这些问题记录了下来。他还有意就这些问题与历史学家 P. C. 维拉科特(P. C. Vellacott)进行了讨论。1931年,综合了巴特菲尔德史学思考的小册子《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这本书的前四章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历史进程的讨论上,而五、六两章则主要集中在史家技艺以及道德判断的问题上。关于历史进程,巴特菲尔德吸收了兰克“所有历史事件都相互联系”的主张,同时汲取了伯里关于偶然性和历史境遇的认识。他认为,历史进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迷宫,每个历史参与者的愿望和行动都卷入其中,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换言之,历史转变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关于史家技艺和道德判断,巴特菲尔德一方面赞扬了自吉本以来的“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研究态度,并揭示了历史概说的难处,另一方面则批判了历史学家急于对历史人物定罪的心态。本书的前四章更多地针对屈威廉,屈威廉本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就此说道:“我是最后的辉格史学家。”这本书最后一章的矛头则直



指阿克顿勋爵和他的道德判断。

这本书的出版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O. 柴德维克在评价此书时说：“这部作品终结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写作。它使历史学家进入到自我反思和小心谨慎的状态。我们只能从两到三本书中获得关于历史编纂问题的富有成果的现代思考，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观念不仅在思想史和历史编纂领域引起了反思，在科学史领域也同样掀起了反思的热潮。“辉格做派”(whiggishness)一语现在也已成为目的论式的、英雄式的历史叙述的代名词。

对于巴特菲尔德个人来说，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巴特菲尔德思想中核心问题的成型。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把早年的非国教信仰和伦理融入到了剑桥大学的学术探讨之中，最终选择了一种既非自由派，也非福音派的宗教态度。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把自己置身于 1920 年代的史学争论和冲突之中，并通过批判地学习坦普利、屈威廉、伯里、阿克顿等史学巨擘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立场。

三、“新辉格”和“调解人”巴特菲尔德

《历史的辉格解释》出版之后，曾一度给巴特菲尔德带来了“反辉格”的名声，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其一，这本书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辉格派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编纂，它所针对的是所有历史概括和历史写作的困境。其二，相比较托利党而言，巴特菲尔德自己更倾向于辉格派的政治传统。早在他的本科阶段，他就被辉格党政治家 C. J. 福克斯的人格所吸引。他与辉格派知识分子屈威廉心



有戚戚,也非常崇敬被称为“天主教辉格党人”的阿克顿勋爵。辉格派的政治传统以及温和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契合他的非国教循道主义(Methodist Nonconformity)。当时的一位顽固的托利党学者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ythe)在评论这本书时敏锐地指出,即使有一本《历史的托利解释》,托利党一方也不会得到什么安慰。他认为,巴特菲尔德好像是在努力改善自己所身处其中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为托利党人辩护,因此他认为,这本书最好命名为《旧辉格面对新辉格》(*An Appeal from the Old Whigs to the New*)。有趣的是,巴特菲尔德也承认自己是“辉格派”,但他强调说,他与欧陆或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对于人性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阐述他的“新辉格主义”时说:“与欧陆或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同,我的辉格主义并不是理想化的。且不说希望人类将会是善良的,假设他们本就善良也不会有效。我的政治学能够起作用,其依据就是人类有许多自我中心主义和贪婪,所有的人概莫能外,尤其是那些声称自己从不贪婪的人。”作为一个新辉格派,他看重个体的价值、热爱自由和宽容精神,但也认为历史学应该是结合科学与文学的谦逊的研究。

《历史的辉格解释》所呈现的问题还有巴特菲尔德自身史学立场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强调个体人格和意愿、目的的重要性,这在他关于拿破仑外交政策的专著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历史局势、境遇和偶然性对历史进程的关键作用。实际上,巴特菲尔德在面对类似的悖论或争论时,往往会选择一种宗教性的调和态度。在面对关于一个问题的两种对立的立场时,他会努力地超越争论双方的问题框架。他会通过想象从内部理解争论的双方,



然后会分别批判各方的错误和夸张的地方,最后辨识出双方所剩下的真理。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凭借更高的洞见调和各种真理。这就是他在面对自由派与福音派之争时所做的,后来在面对屈威廉与伯里的争论时同样这样做,1930年代以后他也用同样的方法面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政治冲突。具体到《历史的辉格解释》,他运用调和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尽可能地吸收与他所看重的个人价值和自由观念相反的史学观点。这本书强调了现实历史中的条件和限制,并着重描述历史进程的超个人特点。他说,所有个体都陷入到“情势之网”中,个体的目的会被历史进程的局势所扭曲。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我们希望人们应该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责,我们仍不能对他们做出最终的道德判断。C. T. 麦金泰尔强调,这样的调和态度成就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巴特菲尔德的独特性。

巴特菲尔德的整个学术生涯经过了一战、二战以及冷战时期。作为一个看重内在精神生活的卫理公会教徒,外在历史中上演的一幕幕人类悲剧不断地刺激着他的心灵,促使他运用调解的态度进行超越性的思考。一战中同盟国对战争正义性的政治宣传让他感到震惊,这是他进行外交史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内在动力。他在《基督教、外交与战争》中说道:“对我们文明的最大威胁就是相互斗争的大型组织集团的自以为是,每一方都只以在对方身上找到邪恶为乐,每一方都只乐于把对方的罪恶作为更深的憎恨的凭据。”他对于自以为是的正义的警惕,对于原罪的宗教性认识,以及对于道德判断的谨慎,似乎可以解释他对于纳粹及其支持者的同情态度。无论如何,巴特菲尔德最著名的著作《历史的辉格解释》,是在一战战后知识界普遍反思进步史观的背景下诞生的;而



他 1948 年之后直至 1956 年关于“基督教与历史”的持续性思考，则又契合了二战后欧洲基督教复兴运动的时代背景，所有这些都显示着巴特菲尔德在 20 世纪思想史中的重要性。

关于巴特菲尔德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约翰·文森特认为他是“英国二十世纪仅有的两位伟大历史学家之一”(John Vincent, *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History*, 1995), J. M. 特纳认为他是与 T. S. 艾略特、C. S. 刘易斯同等重要的“伟大的世俗神学家”(J. M. Turner, “The Christian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Proceedings of the Wesley Historical Society*, 1987), 乔纳森·哈斯拉姆认为他的思想“令人生厌，他有一种恶作剧式的幽默”(Jonathan Haslam, Review of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erbert Butterfield* by Michael Bentley, 2011), 大卫·加纳丁认为他是一个“咯咯傻笑，不断抽烟，攻击传统的人，一个永远 35 岁，从没有真正成熟地成为严肃而多产的学者或重要历史学家的人”(David Cannadine, *G. M. Trevelyan: A Life in History*, 1992)。这些评论，无论好坏，都试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给巴特菲尔德一个清晰的定位，但似乎任何评论都无法阻止对于巴特菲尔德的多角度解读。巴特菲尔德广泛的学术兴趣、虔诚的宗教信仰、调和论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待纳粹崛起等当代历史问题的暧昧之处，恰使巴特菲尔德成为 20 世纪思想史上颇具魅力的人物。

译者

2012 年 6 月 4 日

